

鲍尔斯《赢利》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

陈茂林 金安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理查德·鲍尔斯的小说《赢利》以双线杂糅的叙事方式,反映了宏观上资本的无节制扩张与微观个体生存的冲突,揭露了资本主义科技导致的生态问题,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的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小说主张实现社会和生态正义,抵制欲望,回归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解决生态危机之道。《赢利》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为当今社会正确运用科技、缓解生态危机提供启发。

关键词:理查德·鲍尔斯;《赢利》;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性;技术异化;消费异化;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5-0039-07

0 引言

作为“X一代”(Generation X)^①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当代美国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 1957—)在多部作品中积极探索和反思资本主义科技文明时代社会、生态和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以往不同的是,鲍尔斯在其第六部小说《赢利》^②(*Gain*, 1998)中把生态问题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联系起来。小说以双线杂糅的叙事手法,把克莱尔公司的漫长发家史和主人公劳拉罹患癌症并迅速衰亡的情节相互并置交织,实现了远与近、慢与快、得与失、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的碰撞。生产者(克莱尔公司)白手起家,通过技术革新,抛弃商业道德进行资本积累,逐步实现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市场化和商品化,造成人、自然和技术的异化;消费者(劳拉们)作为资本主义关系圈中的一环,被资本牵引与设计,受到消费文化的操控而过度消费,反而成为被消费对象。《赢利》将被资本操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串联一起进行叙事,揭示出看似繁荣昌盛的人类文明进步下的双方共赢,实际是一场以自然资源和道德伦理为赌注的“零和游戏”,并犀利地指出在技术异化与消费

收稿日期:2023-04-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研究”(17BWW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茂林,男,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生态批评研究。

金安,女,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生态批评研究。

引用格式:陈茂林,金安. 鲍尔斯《赢利》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J]. 外国语文, 2023(5): 39-45.

①“X一代”出自道格拉斯·考普兰(Douglas Coupland)的小说《X一代》(*Generation X*, 1991),文学评论界借用该名词来指称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美国新一代青年作家,包括威廉·沃尔曼(William Vollmann, 1959—)、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 1957—)、道格拉斯·考普兰(Douglas Coupland, 1961—)、凯瑟琳·克列默(Cathryn Kramer, 1957—)、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 1959—)。他们受到后现代小说写作风格影响,又熟悉现代科学技术,十分关注信息技术时代的社会问题。

②关于鲍尔斯小说*Gain*题目的翻译,国内学术界接受度较高的主要是《营利》和《赢利》,笔者认为鲍尔斯采用“gain”是指包括法人以及个体的逐利,另外“gain”反向暗指了“lose”。汉语“营利”大部分指近现代商业组织寻求利润,其反义为“非营利”,而“赢利”对应着“亏损”,暗含着“得”与“失”,“赢”与“输”的双关含义,构成反讽,形成张力。本文采用“赢利”的汉译,以凸显鲍尔斯对资本主义商业、科技和制度的批判性反思。

异化作用下,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逐渐异化,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体现出深刻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

1 企业“兴旺”、个体衰亡的双线叙事: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批判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是近年产生的批评流派,以对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的重视,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社会批判和制度批判而著称,将生态危机的根源确定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异化消费”,主张通过“开放型科学技术、人与自然关系控制、消费欲望消除”,走向“生态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来解决生态危机(陈茂林,2020:79)。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重要方面,是对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使工人阶级沦为丧失思维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加剧了资产阶级对自然和工人的双重控制,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马尔库塞,1982:129)。通过聚焦资本主义企业和个人的双线并置叙事,《赢利》批判了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小说构建了两条看似毫无关联却实际互补的叙事主线,以强烈鲜明的企业和个人命运对比,揭示资本主义商业巨头成长与个人生存之间的微妙联系。小说中克莱尔家族历经五代,自19世纪30年代在新大陆创办以肥皂与蜡烛为主要产品的三人手工作坊开始,之后通过对技术、商业模式的不断改革,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时期跃升为横跨世界经济版图的跨国公司。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克莱尔公司入驻雷斯伍德小镇并成为该镇最大的雇主和供应商。居住在雷斯伍德小镇的单亲母亲劳拉成为另一条叙事主线的主人公,小说详细描述了劳拉从罹患癌症、接受化疗到被癌细胞吞噬全身直至死亡的故事。处于资本主义科技飞速发展时代的双重叙事结局截然相反:克莱尔公司(法人)依托科技走向繁荣顶峰,而被科技包围的劳拉(个体)却走向衰亡。

首先,《赢利》聚焦克莱尔家族企业经济效益直线上升,貌似日益兴隆的叙事主线,在故事层面揭露资本主义企业导致的生态危机,批判了资本主义科技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榨取。资本主义科技是资本家攫取自然红利、进行资本积累、榨取自然资源的有力武器。《赢利》中克莱尔家族是美国早期清教徒移民中的代表,其主打产品“肥皂”与初代克莱尔对宗教“纯洁性”的追求不谋而合。然而,“纯洁”“洁净”本质上是对本体中“杂质”“脏东西”的一种否定和驱逐,它反映了毋庸置疑的强权、专制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而象征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洁净情怀在资本主义时代由神学走向科学,异化为克莱尔公司“赢利”至上的隐喻。化学是“把混合体分离出来,把各个部分重组为新的混合体的艺术”(Powers,1998:45)^①,制皂过程是一次奇妙的化学置换反应,是“科学与特质的微妙联姻”(43):脂肪通过失去丙三醇和得到碱后成为肥皂。在“得”与“失”之间,资本操控皂化反应,将生产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将“不合理成分”逐出,导入“有效成分”,从而变废为宝,达到由污垢向洁净的跨越。

从叙事层面看,克莱尔公司似乎日益繁荣,但小说的故事层面却告诉读者,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将酿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因为资本主义科技包含不合理因素:“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马尔库塞,2006:17)《赢利》中的

^① Powers, Richard. *Gain*. New York: Picador, 1998. 国内尚无该小说译文,文中所有引用均为笔者翻译。后文引用,只在正文中标注页码,不再一一作注。

克莱尔家族选择依赖化学技术革新来寻求更高效的“洁净”效果,加大了对阻碍商业扩张的任何异质与不合理成分的打击,从而与宗教初衷渐行渐远。为了度过经济危机,克莱尔公司通过重重相叠的氢化反应和氮化反应,生产出新型合成洗涤剂作为“脂肪和油的替代品来突破大自然的最后瓶颈”(356),以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的目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肥皂“是起分离作用的成分……‘驱走’脏东西”,但是合成洗涤剂“杀死”脏东西,“完全是火的代表,是救助者,也是盲目打击者”(2016: 26)。克莱尔公司的新产品磷酸化洗涤剂是人类对“洁净”背后“赢利”需求外溢的产物,它提高了生产率和购买率,与资本主义时代的速度话语应和,却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帮凶。“某天,美国一觉醒来却发现最大的湖泊正在濒临死亡”(382),归结原因是克莱尔公司大量排放的磷酸化工业废水。“通过生物富集使水老化的过程”(382),本是一次缓慢而持续几千年的自然变化过程,如今由于化学技术的介入,竟在短短的十年中发生急剧变化。资本家凭借科技惊人的生产力,把科技作为资本掠夺自然的工具,“将自然资源当成免费的午餐”,忽视了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性。

其次,《赢利》通过聚焦尽享科技便利的劳拉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生命尽头的叙事主线,突显资本主义科技对人生命的摧残,批判了资本主义科技对人的主宰和伤害。资本主义社会里,科技作为工具理性,企业作为生产者,个人作为消费者,自然作为资本榨取的对象,其悲惨命运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科技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推手,对自然和人的主宰与控制日益严重,不但酿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还严重摧残人的身心健康。小说中,失控的自然变化预言了失控的人体细胞。当湖泊加速消亡时,雷斯伍德小镇居民的生老病死也正在非自然化。虽然劳拉与企业的发展似乎毫无关系,“她不为公司或公司中的任何人工作”,但她却已经和企业成了“利益共同体”和“风险共担体”(Brooks, 2013: 441-464)。劳拉是雷斯伍德小镇居民的缩影:克莱尔公司为雷斯伍德小镇带来了工作、金钱、居所和生活服务,但也给小镇居民带来疾病。小说伊始,劳拉看似只是一个患癌女孩葬礼上的旁观者,但丧钟却早已为她而鸣。女孩的葬礼是劳拉死亡的前奏,体内的癌细胞加速了她走向坟墓的步伐。劳拉体内失控的癌细胞是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和自然失序状态的隐喻:用来描述癌症的寓言让人联想到一种不停的经济灾难:不受节制的、畸形的、混乱的增长导致的经济灾难。肿瘤有能量,而不是患者有能量;“它”失控了……癌细胞的生长是没有限制的,它们会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不断地生长和蔓延,破坏身体的正常细胞、构造和功能(桑塔格,2003: 57)。

然而,加速劳拉快速衰亡的不仅仅是她身体里无序增长的癌细胞,代表现代医疗技术的化疗更是难辞其咎。化疗技术再度演绎了皂化反应的专制与强权:混乱生长的癌细胞成为破坏体内其它细胞生长的“敌人”,因此化疗将不惜一切代价把癌细胞赶出体外。化疗药物在本质上与合成洗涤剂并无二致,它们都是“盲目的打击者”。“治疗要比疾病本身更加糟糕”(263):劳拉接受来自克莱尔公司制造的化疗药物时,受到“系统性的中毒”(89)以及半年的呕吐和脱发等症状的困扰,而化疗的副作用却需要另一种药物治愈,但是新药又会带来新的副作用,如此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过分依赖化疗技术,企图改写生命循环规律,采用盲目打击的方式将癌细胞驱逐,体现出对生产和利益的狂热追求。生病意味着“生产力的下降”,死亡意味着“不生产”,人类不顾一切地追求健康无非就是不顾一切追求生产,而维持生产无非就是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畸形地捍卫自身的利益。劳拉在患癌初期一边坚持在家办公,一边接受化疗,企图迅速战胜癌症并恢复正常生产,但即使如此她仍因生产力下降而面临失业。劳拉并非只是生态危机的被动受害者,依靠化疗技术来维持生产是她的自主选择,这与将科学技术纳入资本积累之中的克莱尔公司并无二致。

《赢利》将克莱尔公司的崛起与劳拉之死这两条叙事主线串联一起,彼此独立又相互交织,共同推进故事情节发展,使资本主义科技支撑的企业“赢利”与个体消费者“生命丧失”形成强烈对比,构成巨大反讽:资本主义科技发展没有使环境更加优美宜人,没有让人生活更加幸福;相反,却造成生态危机,致人死命,由此批判了资本主义科技对人和自然的双重榨取和剥削。资本主义科技成为资本家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企业要想成为“赢利”中最大的胜利者,就必须不断依赖科技抵制任何阻碍资本主义生产的因素。尊重自然规则会否定克莱尔公司进一步商业扩张的需要,而癌症会否定个体生产力,因此克莱尔公司研发的产品必须打破自然规则,必须忽视生命之道来强制延长生命,但是打破自然规则的二者必定自食生态失衡恶果。可见,小说通过展示资本主义企业显著的经济效益和个体生命衰亡的鲜明对比叙事模式,批判了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资产阶级错误地将科技简化为榨取自然、获取利润、奴役人性的工具,却忽视了生态平衡和人的生命健康,从而造成了人、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与疏离,酿成不可挽回的自然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

2 共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叙事交织: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高兹认为,“当今世界生态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理性的盛行,追求利润是经济理性的唯一目的”(朱波,2016:74)。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里,经济理性主宰一切。经济理性就是物质至上、经济至上、利润至上,与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一脉相承,指任何参与经济活动的人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资本主义经济理性追求生产至上、效率至上、越多越好,导致资本家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逐,破坏了自然环境。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赢利》通过构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和个人悲惨命运的双线并置叙事,彼此交织,巧妙地将资本主义生产者、消费者、生态环境置于一条相互联系的存在巨链中,揭示出滥用和依赖科学技术最终会造成生态失衡,而人类终会自食恶果,走向“赢利”的反方向。作品正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的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来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

首先,《赢利》通过聚焦资本主义企业表面繁荣的叙事话语,在故事层面透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危害,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的技术异化和人的异化。经济理性导致技术异化,技术异化导致人的异化,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连锁反应。《赢利》中,技术受到追求“可计算性和效率”的“经济理性”的影响,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的帮凶。鲍尔斯在小说中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与反思主要围绕着克莱尔家族企业崛起展开。创业之初,克莱尔兄弟雷佐夫和塞缪尔与爱尔兰裔手艺人恩尼斯怀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及对自然的好奇心与敬畏之心,一同创立了一家手工作坊。三位创业之父秉持童叟无欺的为商理念,合理利用科学技术,从油污中提取出肥皂,在给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的同时也给公司带来丰厚利润,实现了生产者、消费者、自然三者的良性互动。但为了扩大生产,克莱尔兄弟资助幺弟班杰明成立化学实验室,为企业产品革新提供化学技术的支持,从此科学技术被商业操控,从纯科学领域踏入应用科学,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虽然班杰明一再强调“化学不再是制皂的工具,相反制皂是实现化学目的的手段”(93),企图把科学崇高化,以掩盖科学商业化的本质,但他对科学“点石成金”“变废为宝”“无中生有”的超凡魔力的膜拜,却又暴露了他利用科学技术试图改变自然规律以达到赢利目的的虚伪面孔。浸透着金钱关系的科学技术已经不是人类探索自然宇宙未知奥秘的方式,而成为资本主义异化人的手段。

资本积累的方式就是无限追求生产力,于是企业愈是追求生产最大化,愈是会加强技术革新,而技术革新又会进一步强化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资本主义扩张中,企业逐渐背弃了商业道德,用机器与科学技术强化了对工人的剥削行为,工人阶级由此从事异化劳动,从自由的状态逐步滑向不自由的、受奴役的阶段,成为丧失思维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创业之初,合伙人恩尼斯只想赚够钱为妻子造一块墓碑、为资助自己写本小说和在诗歌的环抱中安度余生提供物质基础;“雷佐夫在工厂中开了一家小商店来满足工人的日常需求”,允许工人们深夜进行自我提升,而塞缪尔则出版了工人著作,他相信工人会最终“走向诗歌”;班杰明学成归来,看着商铺林立的街道,尚能想到“田野间的百合”,发出“人类企业终会如同暴露在空气中的铁一般走向灭亡”的批判性话语(82)。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工人阶级渐渐丧失了自我发展和自我解放的机会:恩尼斯沉溺于制造更大的水壶来生产更多的肥皂的幻想中,其余生只能与那些形如怪兽/野兽(“monster”“beast”)的制皂容器为伴;流水线作业逼迫工人从事枯燥乏味、缺乏创造力的工作,塞缪尔感慨道:

他怀念自己能够熟记所有员工名字的日子。他现在甚至不能通过肉眼认出这些人。他迷失在雷鸣般的蒸汽动力轴和皮带丛中。那些笨重的机器总以高昂的价格定制,但它们故障的次数比运行的次数还要多。(191)

克莱尔家族甚至摒弃家庭伦理,将班杰明彻底变为赢利工具,他的化学知识只不过是塞缪尔和雷佐夫寻求更为廉价且可行的回收废甘油方法的捷径,而班杰明“在私人文件夹中所做的每一个标记都成为公司的财产”(92)。技术异化加速了人的异化:人变成了机器!人不再是完整的人:“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马克思等,2009:33-34),劳动性质从人的属性中被剥离开来,从而被不断数据化、简单化和经济化,成为经济计算过程中衡量金钱的尺度,沦为经济理性的牺牲品。

其次,在话语层面,小说《赢利》聚焦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消费者的个体沦为技术奴隶的叙事,彰显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对人的主宰和控制,进而在故事层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的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阿格尔,1991:494)。经济理性导致技术异化,技术异化刺激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生产过剩。为了维护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企业制造虚假需求,造成异化消费,以便实现再生产,最终加剧生态危机。《赢利》中,克莱尔产品依托科学神话却已然超出了自然的尺度,无法真正实现“点石成金”的奥义,于是通过营销手段和虚假宣传将科学技术变为粉饰商品功效的噱头,这成为克莱尔公司欺骗消费者的新手段。班杰明在南海考察时发现的印第安根茎(Utilis)只不过是一种缓解腹泻的普通草药,“不知名却早已记录在册的百合科肉质植物”(357)。但是克莱尔兄弟却嗅到了 Utilis 的商业价值,并通过篡改数据使这种奇特的草药具有了“起死回生”“延年益寿”的神力:“Utilis 有着特效药物的气味,它看起来很有恢复性,感觉起来也很治愈,闻起来像天使在上帝自己的病房里涂抹的搽剂。”(138)生产者并不关心由 Utilis 制成的肥皂的实用价值,却将“延年益寿”“基督救赎”“印第安”作为卖点,以迎合消费者洗净自身罪恶得到救赎的需求。然而,这种印第安根茎因为水土原因无法在新英格兰引种,克莱尔公司不得不进行化学合成,以假充真。

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仅需进行简单的化学合成以及文化符号加工,便可实现控制消费者的目的,导致异化消费。在商品的符号化宣传中,消费者失去了独立思考自身真正需求的能力,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劳拉们被商业营销手段所掌控,对消费行为怀有爱恨交织的心态。在劳拉的生活中,克莱尔公司的商品无所不在,而当她发现之时,自己却已经无法将“克莱尔”驱逐出境了;虽然劳拉意识到癌症与

克莱尔公司的产品有关,但她却再一次被“纯天然树脂”的卖点吸引去购买克莱尔公司的化学药品;劳拉也知道超级杀虫剂才是造成花园寸草不生的罪魁祸首,但她却仍然无法“离开神奇的添加剂和超级杀虫剂而生存下去”(295)。劳拉们陷入克莱尔公司布置的消费陷阱,逐渐成了“异化消费”的受害者却拒绝醒悟。在弥留之际,劳拉将“克莱尔”兼比作情人和施暴者:

克莱尔把她带到外面吃晚餐、跳舞。他是一位英俊潇洒、身材匀称的中年人。他给她送去了鲜花和贴心的礼物,甚至还为她写诗。他一次又一次到家里接她出去。但常常在每天晚上浪漫的舞蹈之后,接踵而来的却是渴求的爱抚、疯狂的入侵和邀约性的强奸。(392)

劳拉反思自己陷入“异化消费”的原因是“人类过度的欲望”(391),殊不知她过剩的欲望只不过是商业资本操控她的其中一环。由此,“经济理性”主宰下的“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将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卷入共谋的圈套之中,人类看似超越自然,摆脱了被奴役状态,实际上却沦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机器。小说告诉读者,经济理性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是生态的大敌,“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于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佩珀,2005:133)。小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增强了作品的批判力度,体现出深刻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

3 结语

鲍尔斯的小说《赢利》通过构建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主宰的资本主义企业和个人的双线叙事模式,使资本主义企业和个人的命运形成强烈反差,构成巨大情景反讽,产生巨大的艺术张力,深化了作品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主题,促使读者严肃而深入地思考。小说不但批判了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和经济理性对自然生态和个人生命的摧残,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走出生态危机之道。首先,《赢利》倡导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实现生态正义,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互为依托,因此要实现生态正义,必须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正义。作为雷斯伍德小镇的最大雇主,克莱尔公司依托小镇的自然资源赢利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不公正与生态不公正:克莱尔公司一方面不断剥削劳动者,榨取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另一方面垄断生态红利并导致生态破坏,给小镇居民的健康带来威胁。公众对克莱尔公司的磷酸洗涤剂的谴责推动了无磷洗涤剂的研发;公司被强制雇佣更多的少数民族裔,以减轻就业情况中的种族冲突;克莱尔公司在不断节能减排,“在制造过程中设定了纸张、玻璃、能源、木材和塑料回收周期,并且在石油危机后五年内,全公司的能源总耗下降了30%”(386)。公众对克莱尔公司的诉讼,部分缓解了公司无节制扩张导致的社会非正义与生态非正义。同时,对于资本主义科技引起的人与自然异化,小说主张重构人与自然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只有“保持对自然的好奇和敬畏之心,人才有希望享受与自然的和谐”(孙坚,2015:144)。《赢利》以自然的新陈代谢法则驳斥了生产至上阴影中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并指出死亡不只是生产环节的终结,更是生命的新起点。人的生命属于自然,取自尘土,归于尘土。小说用平静的笔触和诗意的语言将死亡崇高化和唯美化的背后运行的自然法则凸显出来,预示着生命如白驹过隙,而自然运动却亘古不变。

其次,《赢利》主张抵制欲望,回归自然,以克服经济理性导致的技术异化与消费异化。小说的双线并置叙事让读者看到,克莱尔公司不断走向“进步”的巅峰,却即将突破自然法则阈限;劳拉的生命虽正在悄然消逝,但她对生命的感受力却愈发强烈。劳拉之死不仅仅是一个人类自食生态恶果的寓言,也是一次人类反思生态危机,进行自我救赎的缩影。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宰制下的技术异化与消费

异化造成人对物的过度依赖,使得人类失去了自主权与独立思维的能力,因此人类要想寻回自身在自然中的位置,必须打破物欲的禁锢。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阿尔格所希望的,“通过变革人们的消费观念和人们消费希望的破灭消除生态危机”(陈茂林,2020: 85)。《赢利》的双线并置叙事将克莱尔公司的执迷不悟与劳拉的顿悟进行鲜明对比,旨在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表达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美好愿望。

综上所述,《赢利》是一部引人深思的生态启示录。贯穿小说始末的双线对位叙事书写向我们揭示,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和经济理性必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一方面,劳动者在机器生产中丧失精神追求和感受力,自然资源被大量卷入商品生产又被大量浪费;另一方面,科技助力的资本主义生产使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商品被虚假宣传遮蔽使用价值,人类为虚假需求买单,陷入异化消费怪圈。因此,生态危机下博弈的资本主义企业和个人皆不是赢家。作品虽未找到彻底解决生态危机之道,但其丰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意蕴,可为当今社会正确运用科技、缓解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启示。

参考文献:

- Brooks, R. 2013. "Clean Hands": Post-Political Form in Richard Powers' "Gain"[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3: 441-464.
- Powers, R. 1998. *Gain*[M]. New York: Picador.
- 本·阿格尔. 1991.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慎之,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陈茂林. 2020. 西方文论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J]. 外国文学(2): 78-88.
- 戴维·佩珀. 2005.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 刘颖,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 赫伯特·马尔库塞等. 1982.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 任立,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赫伯特·马尔库塞. 2006.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罗兰·巴特. 2016. 神话修辞术[M]. 屠友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苏珊·桑塔格. 2003. 疾病的隐喻[M].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孙坚. 2015. 为小说申辩——理查德·鲍尔斯小说研究[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朱波. 2016. 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co-Marxism in Richard Powers' *Gain*

CHEN Maolin JIN An

Abstract: *Gain* is a masterpiece by American postmodernist novelist Richard Powers. By mingling the doubling narrative mode, the novel reflects the conflict between capital's limitless expansion and the individual's hard survival, expose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caused by capitali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riticizes the technological and consumption alienation caused by economic rationality. The novel advocates eliminating alienation by achiev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justice, resisting desires, and going back to nature, hence to eliminate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 eco-Marxist implications of *Gain*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correct 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mitigation of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Key words: Richard Powers; *Gain*; Eco-Marxism; economic rationality;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consumption alienation; ecological crisis

责任编辑:肖谊